

东亚儒学的现在与未来

陈荣照*

儒学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主导了其起源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在东亚的韩国和日本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东亚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儒学在东方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探讨儒学对当代东亚社会的影响与发展前景，对于促进儒学的现代转换和创新，积极参与文明对话，认识儒学在当代世界文明多元互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为21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东亚儒学的开展与影响

韩国的疆域与中国连陆，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商末时，箕子东去古朝鲜。至公元前2世纪，儒家思想就随同汉字开始传入韩国。从此，儒学在韩国得以开拓和发展。中国儒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在韩国都有相应的影响和表现。总的来讲，儒学在韩国的展开，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

*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

断进步,去其保守、过时的思想因素,增加其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新内容。由此普及到广大的民众之中,客观上促进了韩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形成高尚的社会道德和美风良俗。然而,迈入新世纪以后应如何对待和解决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以及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已迫切地需要人们思考了。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也深受儒学的影响。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叙述,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先于日本同中国交往的朝鲜半岛百济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去日本。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文教事业的发展。儒学在日本的展开流传,起初是儒家经典,以汉唐注疏为主,其后才是宋学。德川幕府时代是日本朱子学的鼎盛期,除朱子学外,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阳明学、实学也得到发展。儒家思想因而渗透到日本民众的行为、观念、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结构之中。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传统儒学受到批判而萎缩退化。但由于儒学在日本影响久远,已融入日本的传统文化之中,使其在近代日本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可见儒学在中国的流传演变,在韩、日两国的传播,体现了东方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为东亚三国的社会进步、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已积淀为东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潜植于东亚民众的思想观念之中,成为具有稳定结构的潜质文化。传统的儒学伦理深入民间,构成东亚人民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探讨以儒学的流传影响为主要内容的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现实和未来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儒学促进了东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形成东方文化的鲜明特色,成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儒学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本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互相交流,取长补短,逐渐演变成其民族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东方文化的特色大致包括:亲亲与尊尊同体并用,由敬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施仁爱于众人,并尊崇长辈和君上;提倡民本与忠君,子孝于父,臣忠于君并存,既重忠孝观念,又以民为邦本;着眼伦理本位,重视道

义原则；重群体，重社会，以天下为己任，表现为群体意识、家族观念强；提倡“和为贵”，宣扬“中庸”精神，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合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等等。由于具有以上鲜明特色，使东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体现了儒学对东亚社会的积极影响。

回顾儒学在东亚的承传和影响，可以体会到文化的交流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这是因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既然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就必须适应历史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客观需要。从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看出，凡与国家实际结合得好，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就必然是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时代；反之，不随时代发展而改革创新，不结合国家实际而囫圇吞枣地接受，则会使社会发展停滞，减缓前进的步伐。

研究东亚儒学的重要目的，应是着眼于探讨东亚各国儒学的现代意义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应具有时代性，包括东亚各国儒学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必须与现代化相结合，接受全球化趋向这一时代主题的挑战，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评价取舍的价值标准，实现自身的现代转换。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儒学作现代审视、反思和诠释，发扬其精粹和体现东方民族精神而能为世界文明的共性所吸取的积极成分，克服其流弊及为时代发展所淘汰的内容，这样才能使儒学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东亚儒学的前景与展望

儒学作为东亚历史文化的重要内涵，有不少优秀的人文传统可以继承发扬、综合创新，其中的精粹和体现东方民族精神的积极成分，仍需要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而总结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克服其不足，则有利于弘扬东亚儒学中的优秀文化传统。21世纪的世界文化不会是某个

古老文化的单独复兴，也不可能以欧洲文化为中心，而应是多元而又互补的，既冲突又相融合的，是各种文化、各种文明相互吸取优长而共同创造人类未来的文化。儒学中的和合人文精神不仅可促进东亚各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联系，增进各国人民友好，而且可提供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正确途径和思想理论的指导。

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的主要养分，由此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它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为中国、东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世界文化由多元构成，这是历史形成而又延续至今的客观现实。每一种文明、文化都是在其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中产生，并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各自的贡献，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和文化既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又相互沟通融合，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色。各文化形态和文明体系中具有某些适应全人类、被人类普遍认同的观念、原理和有价值的成分，世界文明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文明的共识来维系而不断发展。儒学面对21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要在保持和发扬自己文明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精神，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学习、吸取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点和长处，在全球意识下，融合不同文明的冲突，吸收东、西方等各种文明的优质成分，提倡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倡导和合文明观，以解决当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引导世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存，寻求共识，把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在新的世纪融会贯通，在世界共性中追求民族特质，既保持儒学文明的个性，又从各文明中提炼出世界文明的共性，由此推动21世纪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

展望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应是东方文化、儒教文明继续崛起的世纪，是世界走向多元文化并存共荣的世纪，也是东西文化进一步交融的世纪。各民族文化及其宗教、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新加坡的发展就吸取了儒学及其他各种文明的价值，提倡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语言与语言的和谐，使信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都能和睦相处，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新加坡在加强国际文化、教育的交

流与合作之外，也着重培养能贯通东西方文化的通才，以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通与发展。

儒学在新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儒学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和平相处，没有排它性，这是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儒学的人文精神所体现的贯通于各文明、各教派之中的世界性在于：儒学适应了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灌输和强加的，而是出于人类社会道德生活自身的内在需求。所以它在千百年后，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价值，不因人为的排斥和批判而失去其活力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儒学在今天，仍可成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和人类道德的基础，它将有助于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进步、繁荣、和谐、文明的新世纪。在新世纪里儒学将发挥出更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不仅在东方，而且在世界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进一步体现出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儒家学说作为东亚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历史上曾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自19世纪以来，儒家学说遇到以民主、科学、法制精神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出现反儒学思潮。同时遭到工业化和西化思潮以及“五四”批孔反传统运动的冲击，其社会影响渐趋削弱。要使儒学在新世纪得以承传发扬，重建儒学伦理是一重要课题。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和随着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日益发生深刻变革的现实，要求儒家伦理的重建须与推进民主、以法治国相结合，才能体现新时代的特点，使儒家伦理之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儒家伦理注重人与人之间互助交往的原则。儒家认为，人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处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人只有在相互交往和协作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仁”。在现代社会，当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给人类带来生活的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传统的伦理道德失落，人性异化、冷漠、自私，人文精神下降，伦理道德观念混乱。其中包括广泛的暴力犯罪、道德败坏、贪污腐化、精神空虚等。这些社会问题单凭技术力量是不能解决的，而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可担负起防止人类精神文明堕落的重任。这是儒学伦理价值观的当代价

值。通过在新社会形势下推行儒家伦理,可使儒家的注重修己爱人、强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讲求自省慎独、以礼待人、讲信用和尊重别人的精神得到社会舆论和青少年的重视,从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孔子的修身思想从人的自我完善的意义上讲,具有个人安身立命的意义;就其更大的目标而言,可使社会完善、天下太平,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

儒学的伦理价值思想重视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义务,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中,重视整体、社会、民族的利益,提倡群体和谐,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提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社会优先于个人,主张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并以对社会、国家贡献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高低。这种伦理价值观具有矫正极端个人主义的积极因素,并对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社会实践一再表明,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去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新加坡李光耀资政明确提出了社会价值在个人价值之上,社会比个人更重要的亚洲价值观。他说:“无论是在繁荣的黄金时代或混乱的年代,亚洲社会从未把个人价值放在社会的价值之上,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我想这就是把亚洲从极大的苦难中挽救出来的价值观。”¹⁾ 这种亚洲价值观强调“团队精神”、国家至上,提倡“人人对社会都应该尽点义务”,它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体现了儒学伦理价值观对东亚各国人民的影响,“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并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²⁾ 重建儒学伦理,提倡具有约束自我的整体意识,可以抑制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维护社会的整体和谐,不因个人主义的过度泛滥而损害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重建儒家伦理应与推进民主、以法治国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讲,儒学与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没有根本的矛盾,只是由于时代的差距,双方所要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罢了。儒学中历来存在着民本思想,甚至有民主思想的萌芽。如《左传》提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和“国将兴,听于民”的重视民意的思想;³⁾《尚书》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

1) 《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3年版,页554。

2) 同上注。

民为鉴的思想；⁴⁾ 孟子继承孔子，提出重民和重视民心向背的思想，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⁵⁾ 反对绝对君权主义，盛赞汤武革桀纣暴君之命，而非臣弑其君，强调“民为贵”、“君为轻”；黄宗羲在对封建君权的深刻批判中，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种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思想等等。这都表明，儒家的民本思想历来强调尊重民意，重视民心向背，反对统治者压制、扼杀民意。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包含了以民众为主的内容，这尤其与现代民主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存在着不同，民主思想强调权利在民，而民本思想则权利在君不在民，民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君主及统治者的“为民作主”，但民本思想强调尊重民意、以民为重的思想仍与现代民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应轻易抛弃和否定。正是由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有重视民意、以民为本的内容和成分，所以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没有根本的冲突，而可以相容，经过现代转化，疏导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重建伦理不仅与推进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应与以法治国相互结合。民主的实施和普遍化有赖于法制的完备和法治的执行。推进民主和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依靠法制的手段。传统的人治思想与德治主张相联系，把国家大事的治理系之于统治者个人及各级官吏的品德和素质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律制度保障和法律监督的可靠基础上。因此，从现代社会的法律观点看，人治概念存在着流弊，不足以应付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建设当代法制社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必须变革传统的人治观念，把伦理重建与以法治国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排斥。从另一方面讲，法治也不能取代道德的作用，而代替德治。道德是教育人们从内心消除犯罪的动机和邪恶的念头，是人们内化于心的一种自我约束力量，伦理约束与法律约束相比，其作用是不同的，也是不能被取代的。即使在当今社会，儒家提倡的道德自律和德治也有它的合理因素和存在的价值，可以防止一旦法律管束不严或有漏洞，而产生违法犯罪行为。所以

3)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4) 《尚书·泰誓》。

5) 《孟子·离娄上》，第九章。

在新世纪弘扬儒学、重建伦理的过程中，应将其与推进民主、以法治国相结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目前世界所有的国家，不管发达或是不发达，都已不可能脱离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而单独从事经济建设。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各国走向开放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世界经济加速了全球化的趋势和进程。然而，在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到20世纪末，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急遽增强，激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万能主义”思想的膨胀，致使人类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人，以主宰者的身份凌驾于自然之上。对森林的砍伐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无节制的毁林开荒，导致森林锐减，全世界森林面积以每年17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森林的流失带来了气候反常、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物种灭绝、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恶果。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污染造成了江、河、湖、海、洋和大气的污染，形成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加剧，灾害性天气不断发生。过度向自然索取，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要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不仅有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们思想观念的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想克服生态危机，在新的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就必须抛弃以人类为中心，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盲目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可以为所欲为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观念。在这个问题上，儒学的环保理念及其生态伦理观可提供借鉴，从而体现出它的当代价值。

在儒学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及生态学和环境学的知识背景。在自然观上，儒家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是相通的，倡“天人合一”、“万物与吾一体”之说，不破坏并注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一思想成为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而与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二分的观念形成

鲜明的对照。儒家十分重视和谐,认为和谐才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正常秩序。儒家认为,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还说:“启螯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⁶⁾ 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在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一向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也主张把人类之爱施之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⁷⁾ 荀子把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和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作为“圣王之制”的内容。要求砍伐和渔猎必须遵守一定的时节,并规定一定的“时禁”期,以保护生物和资源。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⁸⁾ 主张人类与万物交朋友,而不是去掠夺自然。程颢上疏宋神宗,提出环境保护思想,指出古代圣人设“六府”、“五官”之任来顺应自然,整治万物,掌管自然环境及财货之事,严禁破坏山泽等自然环境,所以万物自然生长、丰富茂盛,人们也无财用匮乏之忧。为了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程颢要求朝廷“修虞衡之职”,即认真地行使掌管山泽、山林之官的职责,保物、养物,防止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使人类与天地自然界长久地和谐相处。⁹⁾ 从这里可以看出,程颢作为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就提出了以上环保思想和理念,值得今天的人们吸取和借鉴。

上述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和环保、爱物思想给今天的人类提供了一种生态哲学的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经济、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提高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资源的科学性与道德性,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全面和谐的关系。如果人类为了发展经济和眼前、局部的利益,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就会自食恶果,遭到自然的惩罚,而无法生存下去。当此新世纪来临,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吸取儒

6) 陈士珂 辑,《孔子家语疏证》,卷三,〈弟子行〉,台北文海出版社,《国学集要》本,三编,页253。

7) 《孟子·尽心上》。

8) 《张横渠集·西铭》。

9) 参见《二程文集》,卷一,〈论十事札子〉,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册,页80。

家的环保理念和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人类对其所面临的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的认识,增强环保和爱物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人文主义精神是整个儒家思想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儒家人文精神的剖析,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生命和独特气象,这正是儒家思想特征的体现,亦是与西方文化相互区别的重要内容。

儒家人文主义精神具有超越性和延续性,经时代创新,在现代社会仍能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对“内圣外王”注入新时代的意义而“返本开新”,使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有替天行道的历史使命,培养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对当代文化建设负起自己的责任,不仅个人修身,而且关心群体,关心社会进步,为新世纪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内圣外王”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其语虽出自《庄子·天下》篇,但为儒家所吸取和改造,成为儒家人文精神的体现。所谓内圣,相对于外王而言,指内有圣人之德,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做圣贤的工夫;但仅是修身还不够,还须将修身的成果贯彻到外在的治平实践中去,即外王中去,外施王者之政,由穷理修身达于政事,将圣人之道落实到平治天下的万事之中。在儒学“内圣外王”的理念里,蕴涵着丰富的思想资源,经过现代转换和诠释,可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过去对外王有误解,而内圣则须弘扬。在当今时代,应由内圣达于新时代的外王,通过修身,挺立道德主体,发扬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文化使命感,“替天行道”,培育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对当今文化建设负起责任。并吸收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由内圣之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政治等新的外王事业。新外王的开出,并不外在于儒学发展的自身要求,而是儒学人文精神内在的要求开出新外王,只有根据儒家内圣之学往前进,才能开出新外王来。牟宗三先生认为,不仅民主政治“是儒家自内在要求所透显的理想主义”,¹⁰⁾而且“科学亦为儒家的内在目的所要求,儒家并不反对知识”。¹¹⁾也就是说,由内圣才能开出新外王,新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之学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

就新外王的民主政治而言,虽然现代意义的法治,从本质上讲是民主政

10)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增订版,页15。

11) 同上注。

治的产物，而儒家人文精神则崇尚道德的力量和价值，但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的。法治既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又是一种价值目标。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德的意志和要求，所以二者不相脱离。民主政治是发展到近代的产物，属于政治范畴；而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则源于先秦，并一直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属于思想范畴。二者应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其优势，并相互补充，把当代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而且将有利于法治的完善，使法治发挥更广泛的社会功能。

就新外王的现代科学而言，当今世纪，变化日新月异，知识经济、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出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情形。在当今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儒学文化如何面对新时代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挑战，既保持和认同自身的人文价值，又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新世纪儒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方面，加强对儒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探讨，提倡科技发展与人文教育并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讲，儒学与发展科技并无不相容之处，而是可以相互结合。儒学历来有重视知识的传统，在其仁智结合的体系中，儒学对待知识，科学是开放、包容的。在儒学文化中，内在地具有发展科学的要求。荀子重知，朱熹讲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从荀子到朱熹，均对知识和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自近代以来，儒学人文精神受到了工业化、科技化和西化思潮的冲击，其社会影响已经削弱。工业化、科技化固然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由于随之而产生了与人文传统相分离的弊端，以致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全球性的危机。在市场竞争原理下取得的工业化成果，也使“社会人”变成了“经济人”，人生意义的失落，生产和效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被弄得模糊不清。当今世界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下面，有的人精神生活贫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钱利害关系来确定，而缺乏情感。有的青少年道德沦丧，老人孤苦无依，不少人与世沉浮，感到迷茫、失望、空虚，不知道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为此，加强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研究和推广，解决科技化、信息化与道德人文分裂的矛盾，振兴道德，重建仁本大同思想，倡导科技以人为本，这无疑是当务之急。

三、结 语

以上对东亚儒学的未来发展前景所作展望及对儒家人文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作了探讨,目的是为了结合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掘儒学中恒常的、有价值的人文精神,研讨其在未来如何承传发扬之道,并赋予其新时代的意义而使之“返本开新”。我们的结论是,在当代,儒学还是有其继续存在的价值,问题是,面对挑战,如何应对?儒学应积极参与到现代化及其全球化运动的进程中来,积极参与文明对话,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有些过时的、消极的成分不必保留,现代的人们也不必接受它。而儒学的优长、它的积极性的一面应得到很好的发挥,同时不能把不属于儒家的负面东西当作儒家。儒学的新生命如何开始?儒学的出路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架构,调整儒学在当代世界新文化、文明系统中的地位及定位,人类文明怎样开拓新的道路,应容纳西方文明、民主、科学,又保持发扬儒学的道德理性,不使人类的道德理性堕落,防止生态环境进一步破坏,重要的还是弘扬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发掘其内在资源,使东亚儒学在21世纪,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其应有的贡献!